

傳統氤氳與現代轉型

中西文化三人談



郭齐勇 温伟耀 赵林 著



赵林



郭齐勇



温伟耀

《三人谈》步步深入，有序地展现了儒家文化形态和基督教文化形态发生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进程，它们各自对中西传统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以及它们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并在充分论证其历史合理性的基础上，对之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传统氤氲与现代转型：中西文化三人谈/郭齐勇，
温伟耀，赵林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 - 7 - 208 - 10550 - 8

I. ①传… II. ①郭… ②温… ③赵… III. ①中华文化—研究②西方文化—研究 IV. ①G12②G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9683 号

责任编辑 陈 雷

封面设计 王泽元

传统氤氲与现代转型

——中西文化三人谈

郭齐勇 温伟耀 赵 林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5.5 插页 2 字数 211,000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0550 - 8/G · 1497

定价 30.00 元

—— 传 习 经 典 润 泽 心 灵 ——



序

杨祖陶

刚从巴黎归来，非常高兴地看到了郭齐勇、温伟耀、赵林三位教授的《传统氤氲与现代转型——中西文化三人谈》书稿（以下简称《三人谈》）。赵林很希望我能为之写个序，我迟疑了一下。因为我对这个问题缺少深入的研究，就说我先拜读拜读吧。我抱着先向作者学习的态度，认真读起来，读下去……最后竟达到爱不释手的境地，使我受到不少启迪，促使我重新认识与思考一些问题，我也就乐于为这部主题鲜明、时代感强、坦诚探索、开学术界新风的《三人谈》作序了，我想我的序也许可能会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三位作者与我的关系很不寻常。温伟耀博士是我早年在北京大学同窗、现在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著名学者劳思光先生的弟子；郭齐勇博士是我在武汉大学近半个世纪的老同事、学长、著名学者萧萐父先生的弟子，还系统听过我讲授一年的西方哲学史课程；赵林博士在武汉大学历史系就读本科、攻读硕士时就是我的西方哲学史课堂的最积极而活跃的听课者，后来考上了我的博士生。时隔多年，因为书稿我们有幸走到一起，他们都已经成了相关领域的颇有建树和影响的知名学者，学养深厚，具有通过自己的艰苦研究、独立思考、理论创新而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的优良学风，这是令人欣喜和钦佩的。

三位作者，以一种客观、冷静、理性和坦诚的态度，就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和古希腊至近现代的西方文化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三人谈》步步深入，有序地展现了

儒家文化形态和基督教文化形态发生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进程，它们各自对中西传统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以及它们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并在充分论证其历史合理性的基础上，对之进行了深刻的文化反思。三人谈是在真诚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丝毫没有以往对立学派或观点之间剑拔弩张的“批判”或“战斗”的影子。特别是，国内外的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应邀作为评论人，针对三人的对谈进行评论。此外，还有许多中青年教师、博士生以及传媒界人士进行生动活泼的自由讨论，从而展示出了更加广泛、丰富多彩的观点和看法。在我看来，三人谈可以说是把西学学者和国学学者的对话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和高度，对于进一步开展中西文化比较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最感兴趣、最为关注的是第三轮探讨——“中西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理由很简单：我国正处在现代化转型时期，因而也正面临着如何有效地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基督教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在实现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展示出了什么是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的东西，以便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就很重要了。

赵林教授对西方哲学、文化尤其是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历史发展都有极其独到而深刻精专的研究，具有极强的驾驭复杂论题的思辨能力，并具有将其高深的思辨转化为流畅、明白、生动的语言文字的功夫与魅力。他认为：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需要实现西方文化（基督教的信仰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而要想实现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就必须大力推动科学理性的发展，为此科学理性就必须解决好它与宗教信仰的矛盾。他将这个矛盾运动生动地表述为西欧启蒙运动“一波三折”的发展过程：在英国，科学理性的萌芽借助信仰来发展，将理性精神渗入信仰，并将其确立为基督教信仰的基础（“自然神论”）；在法国，理性精神推向极端，对基督教信仰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无神论”）；在德国，启蒙落脚到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相互

协调和互补：科学归科学——治外界，信仰归信仰——治内心。这是西欧启蒙运动“一波三折”的最后结果，表明作为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督教不是全盘被否定了，而是被扬弃了，即既被否定又被以更新了的形式保存下来了。到了18、19世纪欧洲民众中的宗教信仰大复兴浪潮，更使信仰落实到人心，信仰的真正场所就不再是有形的教会，而是人的心灵了。

温伟耀教授是英国牛津大学现代西方哲学及基督教神学方向的哲学博士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儒学方向的哲学博士，是一位对西方哲学、基督教神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有精深研究的中西贯通的学者。他关于基督教如何应对现代化洪流的论述很值得我们重视和从中吸取教益。在他看来，现代化洪流对基督教带来的严峻挑战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基督教通过坚持和发展基督教的传统教义和基本精神对这些挑战一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应对。对于理性化的挑战：上帝是超自然的存在，上帝设计创造的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及其规律是自然科学的对象，而科学却无法否认上帝的超自然的存在，即是说它不能证明超自然的上帝不存在；对于商品化的挑战：以耶稣基督为拯救他人的自我牺牲的“基督精神”和以对“复活”（终极圆满）的盼望而甘愿忍受痛苦和作出牺牲的“十字架精神”去治疗和克服社会“物欲症”文化，如传教士乐于到最艰苦荒凉的地方去传教；对于商品化带来的世俗化的挑战：面对要求立刻满足当下肉欲需要，心中无上帝和道德生命的观念，等等，基督教并不悲观，而是相信到了现代化的极点，人对现实政治经济失望，是会回到终极关怀上来的；又如对于社会机构从分化（专业化）走向重新相互整合的挑战：通过发挥和发展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基本教义来应对，指出上帝的终极存在不是一个单一的个体，而是“互渗互存”的群体，是一种“分”与“合”的辩证关系。

郭齐勇教授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和20世纪中国现代哲学有广博和独到的研究。他虽然很热爱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但拥

有敏锐犀利的批判眼光，在学术问题上既不盲从权威，也不随俗媚俗，而是通过自己的研究提出独立的见解，以理服己，也以理服人。

郭齐勇教授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基本上是伴随着西方对中国的殖民、奴役而进行的。与此同时，西学也拥入中国，大有全盘置换中学之势。在此情况下，儒学对现代化挑战的回应大体上也是被动的，其特点是“求变趋新以经世”，儒学已呈现出日渐衰微的趋势。到后来才有了“经批判洗礼而重建”的现代儒学的兴起。但是，总的说来，儒学对现代化的挑战的回应是零散的、“乡愁式的‘回归’”，而且大都是失败的。可是，屋漏又遭连阴雨，在反复的“全盘反传统”、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浪潮冲击下，在商品化、市场化的冲击下，儒学可以说是遭到了颠覆性的破坏，儒学中早已成为社会伦理规范的诸种要素所具有的精神价值完全崩溃，中国的信仰、诚信系统完全丧失。在这种情况下，郭齐勇教授认为中国启蒙是到了应当深刻反省的时候了，而近年来兴起的“国学热”，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所表明的正是一种“重建儒学的必要性和趋势”。

那么，儒学应当怎样重建起来呢，或者说，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相适应，儒学应当怎样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呢？郭齐勇教授对此作出了十分冷静、理性的回应或回答——儒家的再建或复兴，即现代化转型，既不是用传统儒学中一些支离破碎的要素来参与现代社会生活，也不是要全盘整体回归过去，而是：“中西文化相互渗透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只能在现代化过程中提供一些曾经养育过中国人和这个社会的良性的精神价值资源，尊重其系统，并努力对它作创造性的扬弃和转化。”

我完全赞同郭齐勇教授的这种回应或回答。这是因为我对传统儒学也曾有过类似郭齐勇教授的思考。

我在拙文《21世纪中国哲学前景展望》（《江海学刊》1997年第4期）中，对中国现有的三种哲学传统或传统哲学——中国传统哲学

(主要指儒家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1 世纪的发展前景问题进行过探讨。我认为当前中国传统哲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面对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接受现实生活和外来因子的挑战以促进自己转型的问题”。这里所说的现实即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所说的外来因子即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因此中国传统哲学所面临的课题也就可以归结为“传统的现代化”,而为此所必须克服的就是“故步自封的惰性”。

一种哲学传统可以通过外来文化因子的推动和吸取外来文化因子而使自己发展更新,这是儒学发展史所证明了的不争的事实。如先秦两汉儒学与外域传入的佛学相融通而演化出宋明理学和心学,后者在近代与外来的西方哲学相交会而形成种种新儒学或现代儒学。但是这种情况也只能在中国传统哲学自身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生和实现。而这种批判继承在我看来应是一个由三个层次构成的统一整体。(1) 通过一种怀疑的态度和深入细致的研究确定传统是否果真如此,解决“事实”问题。例如,郭齐勇教授在谈到颛项的“绝地天通”时说:“我们老是讲中国的天人合一,其实中国的文明史、思想史有一个断绝的过程,是天人相分……然后再合的过程。”(2) 根据社会现实发展的趋势对传统中的诸要素进行鉴别和取舍,解决“价值取向”的问题。(3) 在传统的基础上(即郭齐勇教授所说的“尊重其系统”)把鉴别取舍的结果,作为一种“思想资源”,进行再分析、再综合以创造出反映时代精神的新的哲学思想、哲学观点、哲学原理,乃至哲学系统。在这种创造性的自我批判中,传统仍然保存下来,但是以一种升华了的或更新了的的形式保存下来了,就是说,这个更新了的的东西既是传统对自身的否定,也是传统对自身的肯定的结果:“这种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的统一(即扬弃)就是批判地继承哲学传统的关键和实质所在。”

我正是根据拙文的这些观点而完全认同郭齐勇教授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现代化转型问题的回应或回答的,与此同时我也想

以此来对他的回应或回答作一种理论上的辩护或论证。不知当否？

郭齐勇、温伟耀、赵林三位教授关于“中西文化”的三人谈是一次所有与会者坦诚地进行对话和讨论的会议，因此开得十分圆满成功。这种情况在温伟耀教授临近会议结束时的精彩发言中清楚地表达出来了，我想引用他发言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我的这个序言：“坦白地说，我参加过很多的儒、耶对话的会议，我觉得这个会是谈得最坦诚、最满足、最痛快的。其他我参加过的，总就是要对抗、要互相开火，我的全对，而你的全错，就是这样的举行过去。对话，就表示我们双方都有向对方学习的地方，能够进一步共同来建造一个更美、更接近真理的世界，就是中国文化的现在和未来。”

最后，我还情不自禁地对这部即将问世的《传统氤氲与现代转型——中西文化三人谈》表示由衷的祝贺！对这一重要学术成果的发起者、设计者、组织者和全书的最后统稿编纂者赵林教授付出的辛劳、智慧、热忱与效率深表赞赏！

目录

序 杨祖陶 / 001

壹 中西文化的历史源流与主流形态的确立 / 001

(一) 郭齐勇：儒学的前史——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特征谈起 / 001

1. 颢顼“绝地天通”的意义 / 001
2. 宗统与君统 / 004
3. 西周与中华文明的一贯之道 / 006

(二) 温伟耀：原始基督宗教的源起、发展与性格——从创教者耶稣到米兰敕令 / 009

1. 基督宗教——从犹太教脱颖而出的宗教 / 010
2. 基督宗教对犹太教的承传 / 014
3. 基督宗教在希腊罗马文化中的信仰发展 / 017

(三) 赵林：西方文化的多元发生特点与两极对立格局 / 020

1. 早期西方文化的分离—统一—分离的三部曲 / 022
2. 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 / 029
3. 希腊文化与基督教文化 / 033
4. 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 / 036

(四) 回应、评论与讨论 / 038

贰 儒学和基督教对中西传统社会的影响 / 095

(一) 郭齐勇：汉代与宋代的儒家在社会政治层面的贡献 / 095

1. 汉代儒家奠定了文明中国的政教结构 / 095
2. 汉儒对政治的批判、参与和制度建构 / 097

3. 宋代：道、学、政之间的张力 / 102

(二) 赵林：基督教对中世纪西欧社会文化的影响——西欧社会二元权力结构的形成与发展 / 104

1. 基督教与日耳曼蛮族 / 104

2. 基督教与封建社会 / 107

3. 教俗之争与宗教抵牾 / 112

4. 基督教与中世纪西欧文化 / 114

(三) 温伟耀：儒家价值和基督教信仰对中西传统社会的影响——开启对话的空间 / 116

1. 生命力 / 116

2. 承传与开创 / 118

3. 政、教之间的张力与制衡 / 119

4. 基督教的道德性与儒学的宗教性 / 121

(四) 回应、评论与讨论 / 124

叁 中西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 162

(一) 赵林：西方文化转型的历程——信仰与理性之关系的辩证演进 / 162

1. 近代西方文化变革的时代背景 / 162

2. 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吊诡性 / 164

3. 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的协调 / 169

4.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 173

(二) 郭齐勇：近现代儒学的命运——从离异到回归，经批判洗礼而重建 / 174

1. 中国社会文化被全盘颠覆与知识人恐慌性的反应 / 174

2. 中国知识精英的徘徊与挣扎和中国人精神信仰的再生 / 177

3. 现代儒学：经批判洗礼而重建 / 180

(三) 温伟耀：面对现代化的洪流——基督教与儒学的回应 / 182

1. 现代化的来临——要求我们有跨文化的视域 / 183

2. 什么是现代化 / 184

3. 基督教与儒学面对“现代化”挑战的回应 / 185

4. 面对“全球化”与“信息科技革命”—— 破传统与跨文化性格 / 192

(四) 回应、评论与讨论 / 193

后记 / 233

壹

中西文化的历史源流 与主流形态的确立

（一）郭齐勇：儒学的前史——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特征谈起

承蒙赵林老师的邀请，我有机会和大家面对面交谈。我们很早就想做一个对谈，因为我太忙的原因一直没能兑现，赵老师一直在催我，非常抱歉。赵老师对文明史有很深厚的底蕴和基础，而我没有这个能力，不敢像赵老师那样做宏观的比较文明史的研究。他给我布置的作业，我也没有准备好。所以我的答卷能否合格，老实说，我是没有十足把握的。

现在我们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路径问题。这一问题和赵老师所研究的文明史，以及和温教授、王教授他们所从事的两方面的有底蕴的研究，都是有联系的。马克斯·韦伯做了很多的比较，非常有意义然而又有缺憾。像帕森斯、张光直，在座的各位都很熟悉，他们有所谓“哲学的突破”的观点，也有“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的观点。我们虽然有各自的思路，但我们相信，马克斯·韦伯也好，帕森斯也好，张光直也好，还有很多专家，他们的研究都对我们有一些很深刻的启示。赵老师布置的是，尽量从上古宗教、上古文明开始考量儒学的前史。这很有意义。

1. 颛顼“绝地天通”的意义

我比较喜欢杨宽先生的《西周史》，我觉得在西周史的研究上，杨宽

先生的讨论比较有基础，史料也比较扎实。还有就是最近一些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余敦康教授对于夏商周三代的宗教、中国哲学思想发生的源头有一些讨论。在姜广辉先生主编的《经学今诠三编》（《中国哲学》第二十四辑）这一本书里，余教授有长论文《夏商周三代宗教——中国哲学思想发生的源头》。我的发言主要借助杨宽教授和余敦康教授的一些看法，这是我首先要声明的。下面，我可能要借助他们的文本，讨论自己想要说明的问题。

就像温教授和赵教授要谈到的那样——从基督教、犹太教以及希腊城邦出发来讨论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起源，从发生学的方面来讨论——那么，我们的发生学的讨论也还是可以从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谈起。太史公有《五帝本纪》。五帝，比方说颛顼，大家知道，在《国语》的《楚语下》里就有一段材料，讲楚昭王、观射父讨论《周书》的一个问题——即颛顼“绝地天通”——把地天的通道断绝。据中国文明前史的一些专家们认为，《楚语下》的这条材料，是非常可信的。这一材料的意思是说，颛顼面对当时的民神杂糅——原始宗教里没有固定的神职人员，有一点淫祀，即什么都祭拜。一方面我们崇拜的对象是散乱的，另一方面现实的这些部落的首领们也是散乱的，协调组织不够。我们老是讲中国的“天人合一”，其实中国的文明史、思想史，有一个断绝的过程，是天人相分、民神相分、“无相侵渎”，然后再合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条材料所考虑的是，颛顼使用重，命他为南正，“司天以属神”，即负责整理天上诸神的秩序；使用黎，命他做火正，“司地以属民”，即负责管理地上的百姓。这就断绝了各部落、各氏族的成员任意地和诸神交流的径路，把宗教事务完全统一起来。所以呢，他们对于民神之间的杂糅提出了一个看法，是不杂也不离，不离也不杂。

我们在古文明比较史上可以看到，古印度受到雅利安人入侵以后，文明有了较大变化。它的原始宗教被雅利安人所带来的宗教代替了，然后主张梵我为一。而古希腊的文明发展过程基本上是一个天人相对立的一个看法。根据司马迁《五帝本纪》的看法，或者根据《国语·楚语》中的材料，颛顼对中国上古宗教有一种“绝地天通”的考量，做中国

哲学的前辈们都很重视这条材料。面对这条材料，我们可以提出问题：西周的源头在哪里？殷商的源头在哪里？敬天法祖的中国宗教，它的源头在哪里？概略地说，我们的天神崇拜和祖宗崇拜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曾经发生过这样一种“绝地天通”，反民神的杂糅，提倡的是民神之间的不杂不离。这提供了一个范式。这个范式说的是，在中国古文明、古宗教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之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非常重要的一个相分的阶段。这对于中华文明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颛顼这个人物存不存在，我们还可以再讨论。《五帝本纪》、《殷本纪》等材料，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重视的、中国文化具有源头性的一些资源。接下来看看三代。

三代的问题非常复杂，比方说唐尧、虞舜——他们也属于五帝的范畴，之后开启三代。夏代我们知道，没有很多的材料，但是我们也有夏墟的考古发掘。当年业师萧蓬父先生给我们上课时，有一次很激动，他说他希望看到夏代的文字和典籍出土。可惜天不假年，未能看到。但从《尚书》和《诗经》里，至少对于殷代能有一些了解，比如说《尧典》；殷商时期的很多文献，至少《商书》里的一些篇章是非常可靠的。这些是今文经的一部分，而今文经相当多的部分是非常可信的。

再往下看，王国维先生的《殷商制度考》、《先公先王考》，对于周代的制度性的厘定几乎是不刊的经典。但它里面也有一些问题——如余敦康教授提出来的——对西周和整个夏代、殷代的连续性的考虑过少，跳跃式、断裂式的考量过多。也就是说，充分看到西周不同于前两代的特点，有一点绝对。从墓葬中、考古发掘中、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西周时期相当多的资源还是来自夏殷两代的。如果我们回到中国古文明、古宗教的思考中，那么三代共同的地方，比方说很多的宗教的崇拜、神灵的崇拜，在巫、覡、祝、宗，或者祝卜巫史，在这样一些“绝地天通”以后的神职人员——他们在中国古文明里从事原始的宗教、原始的巫教（的工作）——整理天神崇拜的过程中、整理民间百姓的崇拜过程中，中国古代宗教文化的传统一直在慢慢的延续与发展，有一个大的统系。王震中先生从考古学出发，研究新石器时代的一种聚落的遗址，他

认为中国的新石器时代的聚落的遗址里,大概是有一种原生态的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的过程。他根据考古学的资料提出,中国文明的起源,大体上是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形态。他有这么一个三段式的考量。

王震中先生是历史学家,他的分析是有相当大的考古学的根据。比方说:第一个阶段,是一个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的阶段,它的社会的组织结构表现出是一种家庭——家族——氏族的这样一种结构;第二个阶段是聚落期的时候,是父权制家庭的确立,个体家庭包含在家族之中,然后出现了一些宗教的共同体,比方说家族——宗族的结构,代替了原来家族——氏族的结构;第三个阶段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上古史传说中的颛顼、尧、舜、禹的时代,是都邑国家的形成时期,出现了由父权家族到宗族结构的、带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的以及带有一定规制的礼制的时代。这是王震中先生对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他分析出了这样一个三大阶段论。

2. 宗统与君统

费孝通先生讲到“多元的一体”与张光直先生讲到“平行的并进”,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走向过程中,它的天神崇拜和祖宗崇拜慢慢地形成一个信仰体系,一直到后世的敬天法祖。它还是遵循着颛顼的神人不离不杂原则,处理天上的、地上的统治者的关系。因此中国的社会结构中逐渐出现了宗统和君统的差别。宗统带有血缘集团的性质,但它也是带有大量社会性的一种建构。君统是类似早期国家的这样一种结构。这两者可以合一,也可以分开。宗统里面有相当多的神职人员在起作用。起什么作用?先公先王的意识形态也好,宗教崇拜、天神崇拜也好,慢慢地凝练成维系中国远古、上古社会的两条路径。这两条路径也在合一,是以神职人员作为纽带的。它的社会性的建构,是把祖宗崇拜加进了天神崇拜,由“以祖配天”进而“以德配天”。而这时天神崇拜已经不是自然崇拜了,已经带有非常强的宗教性、终极性。也就是说,自然意义的天虽然还保留,但主宰意义的天是

更为重要的一种精神依托。所以说，尧舜禹的时代，或者说夏商时代的天神崇拜，已经不是对自然天道的一种迷恋，它所带有的更多的是一种对主宰意义的天的崇拜。比方说，大家读《尚书》，我们能看到，在《尧典》、《舜典》中——《舜典》是后来从《尧典》中分出来的一篇——舜继承尧的做法，谈到了“五典”、“五教”，即《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说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已经是中国人文价值的一个典范，虽然我们这里看到的“义慈友恭孝”和后来的这些德目，在内涵上还有所不同，但它大体是中国文明史上的，或者说九族制度上的一种道德的观念。“五教”，包容着五种重要的人文价值。以后，周公、孔子等继承了五德的观念，慢慢建构了中华人文精神，到七十子后学与孟子、荀子等，蔚为大观。

从血缘宗族家族的这样一种制度里，有一种道德性的东西出现了。亲亲、尊尊、贤贤，宗统和君统的二元对立和合一，以及神权和王权的区分与合一，就开始有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在作为社会组织的宗统和作为国家组织的君统中，其实社会组织的宗统要大于国家组织的君统，因为神权在宗统，这还是一个神权时代的原则。所以我们看到在夏代和甲骨的卜辞上有上帝。上帝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上帝的意思是帝，他的地位在上。上帝二字的合一说的是帝，可能是先祖的统称，是先祖观念的一个抽象。直到周代的时候，上帝和天的观念才相结合。我们读《尚书》，研究上古史的人都知道，有很重要的一位专家叫陈梦家先生。陈梦家先生认为甲骨卜辞中记载的殷人的崇拜主要是天帝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主要是上帝对自然天象的主宰。农业社会的神，和人王不是父子关系。他的看法符合历史的状况。夏商周三代的宗教，其实是有一个相当大的延续性的发展，这个我们可以从《甘誓》，从《孟子》所引用的许多经典如《泰誓》逸文等以及《史记》的《夏本纪》、《殷本纪》都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着重讲的是，王权是国家统治的，神权是社会普遍奉行的宗教信仰。至少在殷代，宗教信仰已经开始蕴含，例如孝、友的观念在那时是很普遍的观念。《论语》中记载，孔子引逸《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孔子讨论了殷代的遗臣的政治智